

新生市民主动发展倾向对城市生活适应性的影响：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王益富^{1,2} 秦启文^{2,3**} 潘孝富^{2,3}

(1. 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淮安 223300; 2. 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3. 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为探究主动发展倾向和社会支持对新生市民城市生活适应性的作用机制,本研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采用两个自编量表和一个现成量表,运用两阶段抽样调查法,在作为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的重庆市范围内,对已经取得城镇户口的新生市民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有效样本322人。对采集的数据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和AMOS18.0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化新生市民的主动发展倾向和社会支持均对新生市民的城市生活适应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社会支持在主动发展倾向对城市生活适应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主动发展倾向 社会支持 城市生活适应 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020(2013)-01-0080-10

1 问题的提出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自1979年至2010年的30余年时间里,城市人口由18495万人(占当年总人口比例18.96%),上升到66978万人(占当年总人口比例49.95%)。这说明,大量的中国农村人口伴随着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迁移。人口迁移不单指空间概念上工作、生活场所的变更,更意味

着现存生活秩序的毁灭性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网络与生产体系的解体,还意味着迁移群体必然会面临新的社会网络关系的重组、构建、融合及再适应的问题。本研究中的新生市民,就是指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从农业人口中转移而来、取得城镇户口的城镇新居民。他们的产生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因公共事业建设和商业开发需要,政府通过征地而集中安置的被动失地农民;其二是主动进城务工或经商,通过购买城市商品房转户而成为城市

* 基金项目:重庆市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0SKB22);江苏省2012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指导项目(2012SJD19000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XSH019);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09XJAXLX005);重庆市软科学项目(cstc2012cx-rkx A0134)。

** 通信作者:秦启文,男,西南大学心理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E-Mail:qqw921@s163.com。

居民的主动失地农民。无论何种移民,迁移必然会对其经济、精神方面造成损失和伤害。尤其是面对陌生的城市环境对其精神层面的冲击,需要较长时间调整和适应,需要给予较大的关注与重视(李杰,雅茹,侯友,2011)。

对新生市民社会适应性发展的研究热潮,是从进入21世纪以后才开始的,而且基本上是社会学领域的理论思考,心理学的关切严重不足。到目前为止,所有有关新生市民城市生活适应性问题的探讨,都笼统含括在“移民”、“农民工”或“失地农民”的社会学研究中。尽管新生市民主要来自于失地农民,但是他们已经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转换,因此宜用“新生市民”这一称谓较为合适。城市新生市民的城市生活适应性,一般称之为“社会适应”,也有人称之为“城市适应”(申丛丛,2010)或“城市社会适应”(孙为质,2008)。据调查,新生市民对城市生活适应性状况并不乐观,存在诸多困境,如就业困难、生活成本提高;与原住居民存在社区、心理和社会隔阂;对城市生活信心不足;身份认同偏差,角色转换滞后等(叶继红,2008)。超过一半以上的失地农民认为市民化过后生活状况变差,普遍对现在的市民化生活状况不满意(林乐芬,赵辉,安然,李佳,沈颖妮,2009)。新生市民的城市生活适应性状况到底如何?它是否受到主动发展倾向这一主体因素的影响?我们拟采用模型建构的量化研究范式,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对后续研究有所启益。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新生市民的城市生活适应,是指新生市民落户城市成为城镇居民以后,在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社会关系和职业发展等方

面,经过个体的再社会化(杜萍,杨尚鸿,2011)而顺利完成社会身份转化、习惯城市环境并生活下来的过程。表现为主体的经济生活、社会交往和价值观念的一系列调整变化,以适应新的城市环境(梅伟娟,2011)。新生市民的城市生活适应,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适应(叶继红,2010),同时也是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

很多文献都探讨了新生市民的城市生活适应的影响因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各个层面,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概括如下:影响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因素主要包括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自身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收入、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安置模式本身的缺陷、政策落实及执行力度、社区管理等(梅伟娟,2011)。我国长期实行和存在的城乡二元隔离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谭正萍,2003;陈世伟,2008)以及城乡之间的文化冲突(陈世伟,2008),是造成农民工或新生市民适应障碍的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的薄弱是失地农民或新生市民社会适应困难的重要客观因素(李立文,余冲,2008);城市原住居民的歧视与偏见(谭正萍,2003),加上自我认同失调,是大部分居民尚无法完成新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的主客观原因(张海波,童星,2006)。杜萍和杨尚鸿则认为,影响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生活,促进他们成为城市居民的最主要的影响因子为:发展性消费的理性投入、自我的再学习、城市人际关系的建立、城市社会生活的同化和外部支持系统的作用(杜萍,杨尚鸿,2011)。该研究所谓发展性消费、自我的再学习,可以概括为个体的主动发展倾向,是影响新生市民城市生活适应最重要的内部因素。而社会支持,是帮助失地农民顺利实现市民化

的最重要外部条件。因此,我们将城市化新生市民的主动发展倾向和社会支持作为关键因素,探讨二者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新生市民城市社会生活适应的影响。

所谓主动发展倾向,是指新生市民为适应城市生活,在知识学习、技能培训和社会关系发展等方面具有的内驱力或性向。个体的主动发展倾向具有主动性特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学习动机,至少应该包括知识扩充、技能学习和关系拓展三个方面。毫无疑问,城市化新生市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学习和掌握很多新知识。这是适应城市生活的基本要求与客观需要。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知识水平与其媒介行为(媒介接触频率、内容偏好等)密切相关,尤其是时事类知识水平受到其媒介行为的影响更大;媒介接触内容偏好方面,政法、财经、体育、广告等内容和知识水平有比较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在农民工的人口、经济特征方面,文化程度与知识水平有显著的相关性,对时事性知识的影响比常识类更显著(陶建杰,2008)。一系列调查发现,农民工对职业病危害及防护知识、艾滋病预防、传染病知识等方面的基本卫生知识知之甚少,非常不利于职业健康及职业发展。技能对农民工或新生市民的职业发展及城市生活适应的意义更大。发展职业技能培训,可以快速有效地帮助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增加就业几率,提高务工收入,有助于实现转移劳动力长期稳定的就业。但是,农村转移人口中,掌握了一定专业技能,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人仅占很少部分。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显示,各类技术人才的供给远远低于市场需求量(周梁,2007)。社会关系对新生市民的社会适应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外部支持源。农民工和新生市民多以血缘和地缘为主建立起一种初级社会关系网络,这

种社会关系网络对他们的社会归属与认同、职业发展乃至婚姻和日常生活,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表现在找工作和提供相关工作信息方面,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提高生活技能方面也提供了有效的社会支持(叶传忠,2009)。

本研究中的社会支持,指城市化新生市民在市民化和城市适应中所接受来自家庭、亲友和社会(包括政府部门)在就业与创业、技能培训、居住安置等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有人将失地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细分为情感支持网、工具支持网和就业支持网,发现失地农民社会支持网正在发生变化,既部分保留了农村的特点,又有了些城市的特征。失地后的整体安置割裂了他们原先的社会关系,同时又由于再次就业使得他们与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从而使封闭型的社会支持网不断走向半开放型,关系延伸半径增大(沈菊,2009)。众所周知,社会支持对个体生活状态具有很大影响。失地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及顺利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至关重要。研究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对人来说具有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利于人们积极认识并重建人际和社会关系,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作用(李杰,雅茹,侯友,2011)。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不仅对失地农民有重要影响作用,对其子女的学习生活也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对城市移民子女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同时,社会支持还影响其学校适应(彭彦琴,江波,田婷婷,2011)。

基于上述理论与研究发现,可以推测新生市民的主动发展倾向对其城市生活适应和社会支持均有影响,而社会支持程度,与他们的心理健康、身份认同、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等方面显著相关,从而对其城市生活适应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如

下研究假设:

H1:城市化新生市民的主动发展倾向对其城市生活适应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2:城市化新生市民的主动发展倾向对社会支持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3:社会支持对城市化新生市民的城市生活适应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4:社会支持在主动发展倾向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作用中具有中介作用。

根据上述构念之间关系的假设,结构模型图如1所示。考虑到社会支持在发展性投入对城市生活适应影响的中介作用的性质和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即可能是部分

中介作用,也可能是完全中介作用,因此最初提出两种理论模型,以供模型分析检验时进行比较与选择:模型1为部分中介效应模型,模型2为完全中介效应模型。从统计角度看,两者的区别在于:部分中介效应模型中,主动发展倾向对城市生活适应的回归路径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在完全中介效应模型中,该回归系数参数则设定为0;在模型1中,发展性投入对城市生活适应具有直接效应,社会支持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模型2中,发展性投入对城市生活适应没有直接效应,社会支持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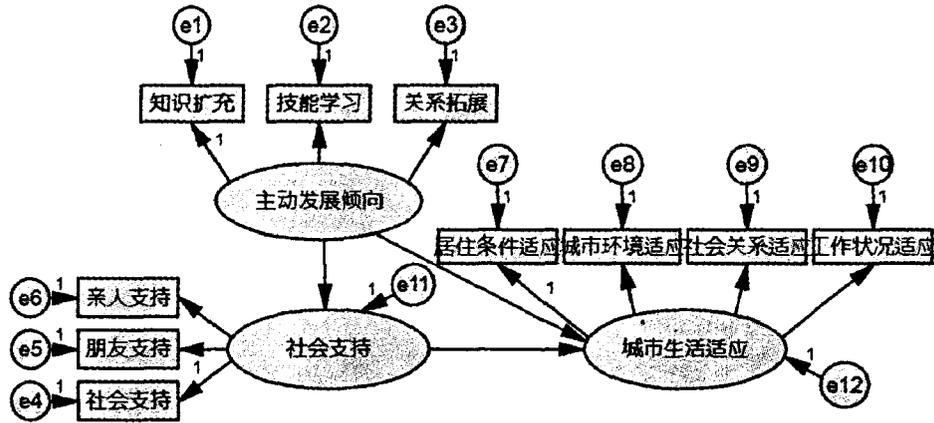


图1 主动发展倾向对城市生活适应影响的结构模型图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工具

3.1.1 城市生活适应量表

自编量表。张海波等人在探讨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时,将概念操作化为经济生存、社会交往、心理认同3个维度(张海波,童星,2006)。范晓光则操作化为生活适应、职业适应、社会认同和人际交往适应4个维度(范晓光,2008)。本研究在上述操作化定义基础上,自编了城市化新生市民城市生活适应量表。经预测和因素分析,确定新生市民的城市生活适应由居住条件

适应、城市环境适应、社会关系适应和工作状况适应4个因子构成。其中,居住条件包括购物、买菜、社会治安等方面指标,城市环境包括噪音、空气和人际疏离等指标,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同事关系等指标,工作状况则包括工作技能、工作稳定性和工作压力等指标,上述变量能解释总变异的62.383%。正式量表确定为12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计分。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alpha = 0.792$ 。

3.1.2 主动发展倾向量表

自编量表。在文献总结基础上提出主动发展倾向的基本构面,经项目编制、初测及因素分析,正式确定该量表由知识扩充、

技能学习和关系拓展三个因子构成。初测量表共12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计分。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因素能解释总变异的66.35%。删除特征根较小的3个项目,正式量表由9个条目组成。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alpha=0.800$ 。

3.1.3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 Zimet 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并对少数条目进行修订。该量表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分量表组成,共12个条目,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计分。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alpha=0.844$ 。

3.2 调查取样过程及样本分布情况

以已经拆迁安置并取得城镇户口的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以作为中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直辖市重庆作为样本点。采用两阶段抽样方式,先分别选定位于重庆市主城区、郊区和县城三个不同区位的安置小区各一个作为样本点,然后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按照门牌号进行系统抽样,统一对调查员进行培训后,采用自填问卷和代填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入户调查。

在调查的新生市民322人中,其中男180人,女142人;汉族309人,少数民族13人;已婚250人,未婚52人,离婚14人,再婚6人;文化程度以高中以下为主,233人,占调查人数的72.4%,另外大专49人,本科36人,研究生4人;被调查对象年龄从20岁到71岁,各年龄段均有适当人数,分布较为均衡;家庭类型以核心家庭为主,三口和四口之家占调查对象总数的76.7%;转户和在城市工作时间从1年到10年不等;所从事的职业涉及建筑、餐饮、生产、销售、驾驶、家政等很多行业,以生产和服务为主,且职位普遍偏低;家庭经济来源以打工和个体经营为主,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70.2%和19.3%。

将收集到的322份有效数据输入SPSS进行初步统计,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软件AMOS18.0进行模型验证与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测量模型内在质量检验

在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中,有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抽取量两种指标,可以衡量各潜变量所代表的测量模型的内在质量(吴明隆,2009)。

城市生活适应量表4个因素的组合信度分别为:0.704,0.718,0.764,0.690,方差抽取量分别为0.586,0.576,0.534,0.527,均在判别标准以上,表明量表信度尚可;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结构模型各项拟合指标较好,其中 $\chi^2=134.556$, $\chi^2/df=2.803<3$;RMSEA=0.075<0.08;NFI、RFI、IFI、TLI、CFI均在0.80以上;PNFI值为0.514>0.50,PCFI=0.543>0.50。

主动发展倾向量表3个因素的组合信度分别为:0.76,0.733,0.715,平均方差抽取量分别为0.514,0.519,0.565,也在判别标准以上。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拟合指标为 $\chi^2=85.011$, $\chi^2/df=3.542$;RMSEA=0.089;NFI、RFI、TLI在0.80以上,IFI、CFI在0.9以上;PNFI值为0.568,PCFI=0.583,表明结构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

4.2 潜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检验

对城市化新生市民的主动发展倾向、社会支持和城市生活适应三个潜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见表1。可见,三个潜变量之间均显著相关,但是主动发展倾向与城市生

活适应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对较小。在控制了社会支持这一变量之后,对主动发展倾向与城市生活适应做偏相关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的相关减弱,由原来的 0.253 降至 0.150,说明社会支持可能是作为两者之间的中介变量而存在的。

表 1 潜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表

	M ± SD	主动发展倾向	社会支持
主动发展倾向	20.406 ± 3.604		
社会支持	42.337 ± 6.565	0.301**	
城市生活适应	38.577 ± 5.224	0.253**	0.407**

注:*** $p < 0.001$, ** $p < 0.01$ 。下同。

对主动发展倾向进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新生市民的主动发展倾向在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人口这几个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家庭经济条件、年龄和文化程度三个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即经济条件较好的市民在个人发展方面的投入,要显著高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市民;老年人口(60 岁以上)的主动发展倾向皆显著少于其余各年龄段新生市民;文化程度较高个体,其主动发展倾向要高于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

分别对城市生活适应四因子进行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城市社会适应在婚姻、家庭人口数量和经济来源等方面的变量上无差异。年龄在城市生活适应方面的差异情况比较复杂:

年龄较大群体(50 岁至 60 岁)的在居住条件上,适应性显著高于青年群体,但是在城市环境的适应性上,老年群体却显著低于中青年群体;对于社会关系的适应感,40 岁左右的群体和 60 岁以上的群体,显著低于 30 岁以下和 50 岁左右的群体;对工作状况的适应性,50 岁左右的群体显著高于 30 多岁和 60 多岁的群体;城市工作时间和城市环境适应和工作状况方面有显著差异。工作满 5 年以上的比刚工作几年的人,其城市环境适应性显著要高,但是工作状况方面,前者又显著低于年资较低和年资较高的人;家庭经济条件(分为贫穷、温饱 and 较富裕三种情况)在城市生活适应各个方面皆有显著差异,生活较富裕的市民在居住条件、城市环境和工作状况三个方面,都显著高于温饱及贫穷水平的市民。但是在社会关系方面,贫穷群体的适应感显著高于温饱水平和较富裕的群体。

4.3 主动发展倾向对和城市生活适应的影响:模型检验与效应分析

4.3.1 结构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检验

对原模型和修正模型两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标如表 2。从拟合指标的总体比较中,可修正后的模型 1 优于原模型 2,因此选择模型 1 做进一步的模型效应分析。

表 2 结构方程整体模型拟合度指标比较

	χ^2	df	χ^2/df	GFI	CFI	NFI	RMSEA
模型 1	31.084	21	1.480	0.981	0.986	0.958	0.039
模型 2	37.343	23	1.624	0.978	0.980	0.950	0.044

4.3.2 模型效应量分析

模型分析表明(见表 3)。三个潜变量之间的三个路径系数,其中两个路径系数,即主动发展倾向对社会支持的作用和社会支持对城市生活适应的作用及其显著($p < 0.001$),分别为 0.486 和 0.444,主动发展

倾向与城市生活适应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94,也达到了显著水平($p < 0.05$)。可以初步判断结构模型关系的假设是成立的。但是,需要对模型所包含的各种关系的效应量进行分析(见表 4)。

表3 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值

目标变量	预测变量	估计值	标准误	临界值	p
社会支持	主动发展倾向	0.486	0.248	5.079	***
城市生活适应	主动发展倾向	0.296	0.175	2.362	0.018
城市生活适应	社会支持	0.444	0.076	3.451	***

表4 模型中各潜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标准化结果)

	主动发展倾向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	0.486***	
(直接效应)	(0.486)	
(间接效应)		
(总效应)	0.486	
城市生活适应	0.296*	0.444***
(直接效应)	(0.296)	(0.444)
(间接效应)	0.216	
(总效应)	0.512	0.444

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量,为主动发展倾向与社会支持之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0.486,乘以社会支持与城市生活适应之间的标准化回归系数0.444所得到的积,即 $0.486 \times 0.444 = 0.216$ 。直接效应量加上间接效应量,则为主动发展倾向作用于城市生活适应的总效应量,为 $0.296 + 0.216 = 0.512$ 。社会支持对城市生活适应的中介效应大小的指标,可以采用效应量比,即中介效应量与总效应量之比来衡量。本研究中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量比为 $0.216 / 0.512 = 42.4\%$,略高于主动发展倾向的直接效应量。

从上述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及中介效应量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社会支持在主动发展倾向与城市生活适应中的中介作用存在,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至此,本研究最初提出的假设全部得到了验证:城市化新生市民的主动发展倾向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对其城市生活适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5 讨论

5.1 关于“城市生活适应”的构念分歧与差异

应该指出,本研究中“新生市民”的概念跟一般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移民”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国内外已有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诸如国际留学生、国际劳务及跨国交流等国际移民群体上,而对于城市化进程中融入城市的新生市民群体的研究,尚未展开,相关研究更是鲜见(因而这里无从就针对这一特定群体的相关研究结果进行比较)。本研究经因素分析后得到的“城市生活适应”构念,与社会学的纯理论建构有所不同。对于城市生活适应结构,社会学研究一般认为包括三个层面,即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田凯,1995;朱力,2002;等);也有人从过程的角度,认为城市生活适应分为“进入城市——完成最初的生存适应”、“定居城市的准备阶段——城市适应层次提高”和“定居行为产生——未完成的的城市适应”三个阶段(申丛丛,2010)。我们认为前者过于宽泛,而后者则难于操作化。本研究从可操作性出发,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后得到包括居住条件适应、城市环境适应、社会关系适应和工作状况适应四因子结构,这四个因子的测量指标,实际上涵括了经济、社会和心理各层面,这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但是,与社会学纯理论构思不同的是,因素分析结果并不支持心理适应成为单一构面。此外,本研究在初期的人户访谈中发现,新生市民实际并没有心理适应问题。

他们的适应问题集中在经济困难、职业发展、城市环境、社会关系等方面,如果有所谓心理适应问题,也包含并体现在这些实际问题之中。不少社会学理论阐释提出的社会身份认同、角色转换、同一性和归属感、城市认同等一系列抽象概念,似乎与新生市民的实际生活图景相去甚远。

5.2 新生市民在主动发展倾向和城市生活适应上的人口学变量特征

对主动发展倾向进行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新生市民的主动发展倾向在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人口这几个变量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家庭经济条件、年龄和文化程度三个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即经济条件较好的市民在个人发展方面的投入,要显著高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市民;老年人口(60岁以上)的主动发展倾向皆显著低于其余各年龄段新生市民;文化程度较高个体,其主动发展倾向要高于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这说明,主动发展倾向是具有条件性的个体倾向性,即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精力和认识基础,新生市民才具有主动发展的动机与能力。

分别对城市生活适应的居住条件、城市环境、社会关系和工作状况四个因子进行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城市社会适应在婚姻、家庭人口数量和经济来源等方面的变量上无差异。年龄在城市生活适应方面的差异情况比较复杂。对于居住条件的适应性,年龄较大群体(50岁至60岁)的适应性显著高于青年群体,可能跟老年人对于居住条件已不太苛求有关。但是对于城市环境的适应性,老年群体却显著低于中青年群体,这可能跟感知觉能力下降和身体健康状况衰退有关;对于社会关系的适应感,40岁左右的群体和60岁以上的群体,显著低于30岁

以下和50岁左右的群体。可能跟这两个年龄阶段刚好处于重要的职业关系转折期有关,30至40岁处于职业发展的上升期,社会关系变化较大。60岁以后退休基本告别了职业社会关系,一时又难以适应;对工作状况的适应性,50岁左右的群体显著高于30多岁和60多岁的群体;城市工作时间在城市环境适应和工作状况方面有显著差异。工作满5年以上的比刚工作没几年的人,其城市环境适应性显著要高,但是在工作状况方面,前者又显著低于年资较低和年资较高的人;家庭经济条件(分为贫穷、温饱和较富裕三种情况)在城市生活适应各个方面皆有显著差异,在居住条件适应、城市环境适应和工作状况适应三方面,较富裕的市民都显著高于温饱及贫穷水平的市民。然而有趣的是,在社会关系方面,贫穷群体的适应感显著高于温饱水平和较富裕的群体。这可能跟贫穷群体在社会关系上安于现状和无所谓的态度有关。

5.3 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本研究第一次提出了“主动发展倾向”这个有别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构念,这对于心理学介入移民社会心理或失地农民生活状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畴与概念。同时,本研究对“城市生活适应”这一构念重新进行界定。上述两个构念都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为进一步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发现:主动发展倾向和社会支持对新生市民城市生活适应具有显著直接作用,只有具备主动发展倾向才能获得更大社会支持,以便增强新生市民城市生活适应性。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我国失地农民的安置和市民化转型,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方法上,直接对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效应量进行分析,通过效应量显著性的检

验来判别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而是此为正确方法。因为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是无须画蛇添足地运用多层回归分析来检验中介效应的。此外,本研究在探讨对新生市民城市生活适应的研究中没有引入过多因素,而是选取了关键变量,达到了模型简化原则的要求。

5.4 问题与展望

中国社会业已开始并将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存在的大规模人口转移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涉及生活适应、职业发展、心理健康及主观幸福等课题,是心理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纵观心理学核心期刊发表的研究报告,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心理学对这类现实生活问题的关注实在太少。本研究无法就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万全之策,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关注、多学科参与的系统工程。而本研究愿意做出微薄努力,以唤起心理学后续研究对此类问题的兴趣与重视。

本研究仅仅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主客观因素,即失地农民自身的知识、技能及社会关系方面的主动发展倾向,和来自于家庭、朋友和社会所提供的社会支持,进行了结构模型检验。但是对于影响新生市民城市化生活适应的其他因素,以及新生市民其他方面的心理学课题,还亟待深入开展更多的心理学实证研究,尤其是可以进行严格设计的改善新生市民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的干预性实验研究。

参考文献

- 陈世伟.(2008). 社会建设视域下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 求实,(2),55-58.
- 杜萍,杨尚鸿.(2011).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性的影响因素探析.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12-120.
- 范晓光.(2008).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适应. 当代青年研究,(4),69.
- 李杰,雅茹,侯友.(2011). 生态移民社会适应、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以内蒙古阿拉善盟李井滩为例. 前沿,(12),182-186.
- 李立文,余冲.(2008). 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 统计与决策,268(16),55.
- 林乐芬,赵辉,安然,李佳,沈颖妮.(2009).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现状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3),68.
- 梅伟娟.(2011). 淮安市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 彭彦琴,江波,田婷婷.(2011). 社会支持与城市移民子女生活满意度:学校适应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探新,(6),54-558.
- 申丛丛.(2010). 劳动力移民城市适应的过程研究——以济南市劳动力移民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大学.
- 沈菊.(2009). 失地农民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以重庆市北碚区失地农民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 孙为质.(2008).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邮电大学.
- 陶建杰.(2008). 一项对农民工媒介行为与知识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7-18.
- 谭正萍.(2003). 成都市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大学.
- 田凯.(1995).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 社会科学研究,(5),90-95.
- 王绪梅,王婷,杨惠琴,韩布新.(2009). 地震后茂县羌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状况. 中国老年学杂志,6(29),1406-1409.
- 吴明隆.(2009).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叶传忠.(2009). 现阶段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 企业导报,(11),35-36.
- 叶继红.(2010). 城市新移民的文化适应:以失地农民为例. 天津社会科学,(2),62-65.
- 叶继红.(2008). 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中国软科学,(1),1-4.
- 张海波,童星.(2006).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 社会科学研究,(1),129.

张海波,童星.(2006).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86-106.

周梁.(2007).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参与意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

朱力.(2002).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6),82-88.

The Impact of Active Development Tendency on the Urban Life Adaptation for New Citizen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WANG Yi - fu^{1,2} QIN Qi - wen^{2,3} PAN Xiao - fu^{2,3}

(1.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China;

2. School of Cultural &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3. Research Centre of Psychology & Social Develop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fast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has hastened a vast group of new citizens move from rural areas to urban places. Two key constructs, Active Development Tendency and the Urban Life Adaptation were constructed to explore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hich tes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Active Development Tendency and the Urban Life Adaptation, on condition that the social support acts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This research adopted a two - stage sampling method, surveyed 322 new citizens of the different residence communities from the downtown, the suburbs, and the county towns of Chongqing with

two self - made scales, Active Development Tendency Inventory and the Urban Life Adaptation Scale, and another ready - made scale Th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ctive Development Tendency and the social support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Urban Life Adaptation, and th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Active Development Tendency and the Urban Life Adaptation is prominent.

Key words: active development tendency, social support, urban life adapta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